

Media Ecology in North America: Theory Spectrum and 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He Zhijun

Abstract: The schools of media ecology in North America, including “Toronto School” and “New York School”, are famous for their innovative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ve and mutually-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ong media technology, culture and aesthetics. A large number of well-known scholars in three generations have emerged so far; among them, Patrick Geddes and Lewis Mumford ha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is discipline.

Harold Innis, who had turned his attention from commodity economy to media ecology, implied in his later stage research that media cast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power relations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His model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provided his successors with a powerful methodology for the discipline. In addition, Innis’s media bias theory and theory of opposition duality between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had started a large project on oral culture and written culture involving Eric Alfred Havelock, Marshall McLuhan, Walter J. Ong, Elizabeth Eisenstein, Robert K. Logan, Derrick de Kerckhove and so on.

If we say Marshall McLuhan, central person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edia ecology in North America,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ndustry man, the publisher and the cyborg under the impact of media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ctronic culture and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and Neil Postman, represent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al scholars, concentrated more on the complex effects towards social behavior and spiritual culture by electronic media such as TV, then, Paul Levinson, a third-generation scholar, and Robert K. Logan — one going through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schools of media ecology in North America — were those who pushed media ecology research into the digital age, mobile Internet era and full media age.

Although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s, distinctive focuses, and even disagreements on such issues as the technology-evolution prospect and media bias, they firm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consistent thinking of the schools of media ecology in North America. Their thinking is mainly that media exert effects on biologic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and cultural ecology. Starting from Mumford, Innis and McLuhan, cultural consequences created by media technology have been attracting much attention from social ecology scholars.

It is without doubt that media ecologists have a great amount of common concerns about media technology: that of Innis’s analysis of space-time bias of media, of McLuhan’s definition of media as the extension of feelings and spirits of human beings, of Carrey’s insights into telegraphy leading to local time-to-death, of Meyrowitz’s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way electronic media casting a complicated impact on social behavior, and of Derrick de Kerckhove’s discovery of the revolutionary influence of virtual reality and electronic money.

Keywords: media ecology in North America; digital media; aesthetics; spectrum; train of thought

Author: He Zhijun earned his PhD in Literature from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Sichuan University in 2005, completed his studies in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Shandong University in 2009, and in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2014. At present he is chairman and professor i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literary aesthetics and media culture, with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such as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sumption*.

北美媒介生態學譜系與代際傳承

何志鈞



[摘要]包括“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在內的北美媒介生態學派，以其別開生面地研究媒介技術、文化、審美的互動互生關係而著稱，迄今已歷三代，湧現出了衆多代表人物。追根溯源，堪稱北美媒介生態學先驅的是格迪斯、芒福德。格迪斯以其人本主義的規劃理論、跨學科的研究思路、人類生態學的理念、所主持的一系列城市調查和振興改造項目，使偶然間讀到其作品的芒福德找到了一生的目標；芒福德則以其人文主義色彩濃厚的技術哲學思想對容器文化與武器文化的區分，對“王者機器”入木三分的批判，為北美媒介生態學派奠定了思路和旨趣，並影響了波斯曼、伊尼斯和麥克盧漢。伊尼斯則從商品經濟研究步入媒介生

態研究，在後期研究中自覺揭示了媒介對社會權力關係和知識格局的重要影響，其研究透視的模式為後繼者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論武器。他的媒介偏向理論、口頭法與書面法對立的觀點也直接開啓了哈弗洛克、麥克盧漢、沃爾特·翁、愛森斯坦、洛根、德克霍夫等後繼者關於口語文化與文字文化的浩大研究工程。如果說北美媒介生態學第一代的核心人物麥克盧漢關注的是媒介技術演替影響下的工業人、印刷人、電子人，視野所及主要是電子技術的文化、心理影響，第二代的波斯曼更多關注的是電視等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爲和精神文化的複雜影響，那麼，第三代的萊文森和橫跨三代的洛根則將媒介生態研究推進到了數字時代、移動互聯網時代和全媒體時代。雖然衆多代表人物的觀點論說不盡相同，在一些問題（如技術演化的前景、媒介偏向等）上的側重點明顯有別，甚至有不小的分歧，但他們都堅定地承續和發揚媒介生態學的一貫思路——媒介影響着生物生態、社會生態、文化生態。從芒福德、伊尼斯、麥克盧漢開始，媒介生態學家們都格外關注媒介技術造成的社會文化後果。無論是伊尼斯對媒介時空間偏向的論述，還是麥克盧漢視媒介為人的感覺和精神的延伸；無論是凱瑞對於電報導致了地方時間死亡的敏銳洞察，還是梅羅維茨對電視等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爲的複雜影響的細緻入微的具體分析，乃至德克霍夫對虛擬現實技術、電子貨幣的革命性影響所做的洞燭幽微的揭櫫，無不顯示了媒介生態學家們關注媒介技術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和塑造作用的共同旨趣。

[關鍵詞]北美媒介生態學 數字媒介 審美 譜系 思路

[作者簡介]何志鈞，2005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2009年從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文藝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出站，2014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出站；現為魯東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系主任、教授，主要從事文藝美學、媒介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文藝消費導論》。

包括“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在內的北美媒介生態學派迄今已歷三代，湧現出了眾多代表人物。這個學派的成員最初多是與馬歇爾·麥克盧漢（M. McLuhan, 1911—1980）和多倫多大學結緣的那些學者，如洛根（Robert K. Logan）、卡彭特（E. S. Carpenter, 1922—2011）、哈弗洛克（E. A. Havelock, 1903—1988）等，他們構成了北美媒介生態學的第一代。波斯曼（N. Postman, 1931—2003）是紐約學派的領袖，也是北美媒介生態學第二代的核心人物。沃爾特·翁（W. J. Ong, 1912—2003）、凱瑞（J. W. Carey, 1934—2006）、莫蘭（Terence Moran）、尼斯特洛姆（C. L. Nystrom, 1941—2010）、特沃爾（Donald F. Theall）等理論家也屬於第二代。萊文森（Paul Levinson）、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斯特雷特（Lance Strate）、曼孔盧姆（Casey Man Kong Lum，中文名“林文剛”）、埃里克·麥克盧漢（Eric McLuhan）、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等第三代代表人物目前風頭正健，著述頻現。由於他們不僅有着類似的學術旨趣、基本的學術信條、一貫的邏輯理路，還有着關注點、側重點的不同，思想觀點的明顯差異，學術探索的不斷推進和超越，因此，有必要對北美媒介生態學的沿革和譜系略做梳理，對其思路和觀念進行考量，以深化中國學者對其研究理路和傳承演變的認知。

—

在所有堪稱北美媒介生態學先驅的人物中，伊尼斯（H. A. Innis, 1894—1952）無疑是最受原創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推崇，對麥克盧漢影響最深的學者，被視為“研究傳播技術影響的第一人”^①，麥克盧漢讚揚“《帝國與傳播》裏有些話似乎暗示說，有可能組織起整整一個學派”^②，但實際上，走在伊尼斯前面，堪稱北美媒介生態學先驅的是格迪斯（P. Geddes, 1854—1932，一譯“蓋迪斯”）、芒福德（L. Mumford, 1895—1990）。他們以其各自獨特的建樹為北美媒介生態學派奠定了基礎。芒福德1934年出版的《技術與文明》被尼斯特洛姆（C. L. Nystrom, 1941—2010）1973年撰寫的博士論文《媒介生態學初探：研究人類傳播系統的一體化概念範式》推崇為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之作，威廉·昆斯（William Kuhns）在《後工業時代的先知：對技術的詮釋》一書中也將芒福德看作是整個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芒福德思想的形成得益於格迪斯、凡勃倫（T. B. Veblen, 1857—1929）。作為英國生物學家、社會學家和城市規劃家的格迪斯，開創性地統籌運用哲學、生物學、人類生態學、人口統計學、經濟學、人類學、宗教研究、社會學方法研究城市規劃，並且高度重視人性和人的需求在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的核心作用，把城市視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有機體，其《城市發展》、《進化中的城市》等著作對工業革命、城市化、科技理性的負面影響高度警覺，其人本主義的規劃理論、跨學科的研究思路、人類生態學的理念、所主持的一系列城市調查和振興改造項目使偶然間讀到其作品的芒福德找到了一生的目標。關於格迪斯對芒福德的影響，諾瓦克（T. P. Novak）總結了三個因素：“第一是格迪斯的生態學視角；第二是格迪斯跨學科、通才型的思維方式、治學方法和城市規劃視野；第三是格迪斯關於知識分子應該行動的觀點，他認為學者應該學以致用。”^③芒福德的技術歷史分期、“王者機器”（Megamachine，亦譯“巨機器”、“超級機器”、“巨型技術”）、有機技術觀均與格迪斯有着清晰可見的淵源關係。格迪斯最先使用了“巨型城市”說法，可謂是芒福德“巨機器”說法的萌蘖。其不同在於，格迪斯的“巨型城市”更多是就城市的體量、格局、地理空間上的急劇擴張、功能的複雜錯綜而言的，而芒福德的“巨機器”則開始觸及人性、政治統治、技術主義、人類文明異化等更為凝重、深邃的核心問題。在紐約城市學院時，芒福德還閱讀了凡勃倫1899年出版的《有閑階級論》，選修了凡勃倫的一門課，凡勃倫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城市文明的透視對芒福德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芒福德首先不是一位媒介學家，而是一位馳名世界的建築學家、技術哲學家。他崇奉人文主

①③ [美]林文剛 編：《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何道寬譯，第5、55頁。

② [加]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 編：《麥克盧漢精粹》（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何道寬譯，第114頁。

義技術哲學，深受人文主義社會傳播觀影響，長期關注技術、機器對人類文明的影響。這顯然與歐美的人文主義文化傳統和他生活的時代有關。他身處的20世紀是一個科學技術越來越顯要的歷史時期，工具理性、技術崇拜、機器對人的擠兌日甚一日，社會文化劇烈轉型。與同時代許多人一樣，他對於高歌猛進的科學技術持反思、警惕的態度，其反思立場、倫理關懷與麥克盧漢、波斯曼有類似之處。他更多的是以批判的態度審視技術，強調人性與技術的和諧協調。芒福德對技術的態度、思考也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化、不斷演變的過程，逐漸從讚美技術的溫和的技術決定論者、“城市之子”，變成了對技術充滿警惕、反思技術的負面效應、對技術的前景充滿憂慮的技術批判論者。《技術與文明》一書堪稱是他早期與後期技術觀的分水嶺，顯示了他對技術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而《機器的神話：技術與人類發展》對技術的人文批判立場更趨明顯，對現代技術更多憂思。

芒福德對波斯曼、伊尼斯、麥克盧漢等均有影響，芒福德的人文主義技術哲學觀、技術歷史分期觀為北美媒介生態學派奠定了思路和旨趣。他之所以被公認為是北美媒介生態學的重要先驅之一，其多學科背景、技術文化視角、人性關懷旨趣可能是重要原因。芒福德一生把技術—城市—文化—生態—人聯結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對城市、城市規劃、人類文明史、技術與權力等問題作了持久的思考。他既從技術的視角審視城市的起源、演變和人類權力、文化的角逐，又不同於技術崇拜論者，自覺從人文主義高度審視和批判技術。而技術最初與傳播往往是一體化的——信息的傳播離不開一定的技術手段，離不開運輸與通訊，信息傳播和技術的更新由此往往盤根錯節，所以，論述技術不可能不觸及傳播問題。關於這一點，洛根曾一語道破：“‘媒介’、‘技術’和‘工具’都是近義詞。……麥克盧漢在《谷登堡星漢璀璨》和《理解媒介》裏分析的活字印刷機既是工具或技術又是傳播媒介。”^①何況，芒福德居高臨下，以廣角鏡式的跨學科方法審視人類文明，一切與人性、人類文明有關的問題都牽動着他的神經。這客觀上使他的影響超越了城市學領域，對傳播研究也提供了積極的啟示。

由芒福德首創的“王者機器”（Megamachine）一詞既是理解他的技術批判思想的入口，也是理解他傳播觀的一個重要契機。無論是勞動機器、軍事機器、科層制的官僚機器，還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鐵的統治者意志和柔性的信仰、思想暢通無阻、無微不至的傳輸都是最重要的一環。“王者機器”是一個高效嚴密的信息系統，信使、侍衛、書記官、秘書、各級實幹官吏、聖旨、文件乃至現代的廣播、電話、電視、網絡在其中都不可或缺。芒福德在論及建造金字塔時代的“王者機器”時就指出，這架大型機器要想運轉自如，“首先必須具有複雜可靠的傳導方式，以確保上峰發出的指令能夠準確迅速地送達到每一個成員”，因此兩個手段必不可少，一個是“集中和組織知識”，另一個是“精細的社會組織結構”。^②

芒福德以其人文主義色彩濃厚的技術哲學思想對容器文化與武器文化的區分^③，對“王者機器”入木三分的批判，為媒介生態學奠定了基礎；他提出的許多命題啟發了麥克盧漢，構成了媒介生態學的核心理念。法國學者曼特（Armand Mattelrt）在其著作《傳播的發明》中甚至指出，早在1934年，芒福德的《技術與文明》就提出了傳播技藝是“人的延伸”和技術變化是文明史的核心這兩個基本觀點。這是後來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人體感官的延伸”思想的直接起源。^④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還指出，電報、電話、電視使人類的信息交流超越了時空的局限，重現了昔日傳播的即刻反應狀態。這可謂是麥克盧漢“重新部落化”和沃爾特·翁“次生口語文化”論斷的濫觴。芒福德與強調電子時代人類“重新部落化”的麥克盧漢堪稱知音。^⑤

① [加]羅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麥克盧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何道寬譯，第9頁。

② [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9），倪文彥、宋俊嶺譯，第9—11頁。

③ [美]唐納德·L·米勒 編：《劉易斯·芒福德著作精粹》（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0），宋俊嶺、宋一然譯，第396頁。

④ 陳衛星：“麥克盧漢的傳播思想”，《新聞與傳播研究》4（1997）。

⑤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Inc, 1934), 239; 李明偉：《知媒者生存——媒介環境學總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32頁。

二

媒介生態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伊尼斯的研究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以皮貨貿易等大宗貿易研究為主，後期以傳播效果研究為主；但是，兩者顯然不是割裂的、對立的——後期研究既是前期研究的轉型，也是前期研究的延展；前期研究為後期研究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從前期研究中已經顯露出了對後來的整個媒介生態學研究產生深遠影響的跨學科、多學科研究的取向。饒有意味的是，這種跨學科視野思路、通才型的思維方式、治學方法也是格迪斯、芒福德的特長。^①即使如此，伊尼斯前後期的研究轉型也不僅是關注點的轉變，而是研究方法的質變。正如麥克盧漢指出的，伊尼斯前期的皮貨貿易研究雖也重視把複雜的事實聯繫起來，以揭示變遷的原因，但基本上還是用報導和敘述變遷的辦法，與傳統的研究模式並無二致；而“後期的伊尼斯”在《傳播的偏向》中開始滔滔不絕地追蹤變遷的原因。他的工作方法改變了，原來是從“觀點”出發，後來是靠“介面”的方法，不是運用分析方法分離事物的一個側面進行具體研究，而是注目於複雜的相互作用過程。他吸引人們去考慮結構成分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權力形態和程式，追蹤每一種權力機構的形態對其他形態起了什麼作用。依靠這種運動的系統，他立即就把社會動機和模型的形象傳遞給讀者。^②這種研究透視的模式為後繼者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論武器，後來者一旦掌握了他的思路和方法，就可以像他那樣去研究問題。

伊尼斯是從商品經濟研究步入媒介生態研究的，其媒介生態研究顯然是其大宗貿易研究的自然延伸。事實上，在伊尼斯的經濟研究中已經顯示出商品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媒介，商品貿易的過程也是文化傳播、生活方式改變和社會革新的過程。伊尼斯的這一研究思路顯示了在當時“運輸”與“傳播”、“交通”與“通訊”的密切關係。在傳媒業尚不發達的時代，信息的傳播離不開鐵路、輪船，因此在後人看來，與傳播、信息迥然有別的交通運輸，在那時與傳播、傳媒卻儼然是一回事。這一事實在伊尼斯與凱瑞（J. W. Carey, 1934—2006）之間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和呼應關係。凱瑞在其《作為文化的傳播》中也不得不面對美國歷史上很有影響的兩種傳播觀：“傳播的傳遞觀”（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與“傳播的儀式觀”（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相比於傳播的儀式觀，傳播的傳遞觀是美國文化中最常用的。顯然，這種“傳遞觀”源自地理和“運輸”（transportation）方面的隱喻。在19世紀，信息的移動在本質上被看作是與貨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過程，兩者都可以用“傳播”這個名詞來描述。這時，“傳播”的中心意思是指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號或信息從一端傳送至另一端。運輸與傳播由此不可分割地被聯繫在一起。即使是隨着電報的出現，這種同一性終結時，人們也無法改變這種已成慣例的隱喻。^③與伊尼斯把貿易、商品、運輸、交通網與媒介、傳播、社會制度、文化心理聯結起來考察，由經濟研究自然步入媒介生態研究不同，凱瑞更感興趣的是這兩種傳播觀的宗教淵源和宗教意味，儘管兩者所指的宗教經驗領域略有不同。但凱瑞仍強調，“運輸”與“傳播”兩詞的“精神含義是在地球上建立並拓展上帝的領地”^④，而傳播的“儀式觀”“並非指信息在空中的擴散，而是指在時間上對一個社會的維繫；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用信仰的表徵”。凱瑞堅信，“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並維繫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⑤伊尼斯與凱瑞的思路和旨趣明顯不同，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媒介生態學家都秉持的人文主義追求。

伊尼斯在後期研究中自覺揭示媒介對於社會權力關係和知識格局的重要影響，在他看來，帝國的形成及其權力格局與傳播方式、傳播格局密切相關，“在政治、組織和實施中，傳播佔有關

① 芒福德說過，“自己的‘任務’是‘撕開束縛人類的藩籬和不許入內的警示牌，讓人們能長得更高，看得更遠’”（[美]唐納德·L·米勒 編：《劉易斯·芒福德著作精粹》，第4頁）。

②④⑤ [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文化”論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丁未譯，第4—5、5、7頁。

③ [加]麥克盧漢：“序言”，《傳播的偏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何道寬譯，第2—3頁。

鍵的一席”。^①伊尼斯將媒介分為“倚重時間的媒介”和“倚重空間的媒介”兩種，後者更適合廣袤地區的治理和貿易，如莎草紙、電報和廣播（羅馬人征服埃及之後，莎草紙的供應源源不絕，成爲一個龐大帝國行政管理的基礎）。而倚重時間的媒介如羊皮紙、黏土和石頭，性質耐久，有利於宗教、信仰的承習。與此相應，倚重時間的絕對王權向倚重空間的比較民主的組織機構轉移過程中，也出現了從倚重石頭向倚重莎草紙的轉移。伊尼斯認爲，一個成功的帝國必須立足在時間、空間兩個方面，保持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之間的平衡。^②同樣，傳播媒介對知識的傳播效應也有着深刻影響。伊尼斯指出，“西方文明受到傳播的深刻影響”^③，“根據傳播媒介的特徵，某種媒介可能更加適合知識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而不是適合知識在空間中的橫向傳播，尤其是該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適合運輸的時候；它也可能更加適合知識在空間中的橫向傳播，而不是適合知識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播，尤其是該媒介輕巧而便於運輸的時候”^④。伊尼斯在其著作中主要關注的顯然是時間偏向與空間偏向的對立，也涉及了口頭傳播偏向與書面傳播偏向的差異。但是他的論述已經顯示出了傳播、媒介的偏向直接影響着時空、權力、社會的偏向，因而也會影響到文明、精神的偏向。在《傳播的偏向》一書中，他指出：“傳播媒介的性質往往在文明中產生同一種偏向，這種偏向或有利於時間觀念，或有利於空間觀念。”^⑤他與哈弗洛克不約而同地致力於研究思想和權力的關係，兩人都認爲“這兩種思想都是人類事務之必需，這是因爲權力的短期思想代表的是空間和控制問題，科學的長期思想代表的是時間問題以及對話、辯證和妥協的精神”^⑥，可謂是時空偏向問題的進一步延展。麥克盧漢恰恰是對伊尼斯關於媒介偏向的思想做了巧妙的發揮，實現了由外向內的逆轉，將其時空偏向的論述引申至感知的偏向論述，從而極大地延伸和推進了伊尼斯的思想。麥克盧漢著作中不厭其煩反復論及的“聲覺空間”、“視覺空間”、“感知偏向”、“媒介即人的延伸”（包括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無疑是對伊尼斯媒介偏向思想的進一步升華。麥克盧漢在他的著作中反復宣稱，任何媒介都會改變人與世界的關係，促成看待世界的新模式，重構人的感知，影響人的感覺比例，“每一種新技術的引入都會改變我們的感知偏向，生成全新的感知區域和麻木區域”。^⑦與麥克盧漢有所不同，波斯曼則將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詮釋爲意識形態偏向，“每一種工具裏都嵌入了意識形態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種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種方式構建世界的傾向，或者說它給事物賦予更高價值的傾向；也就是放大一種感官、技能的能力，使之超過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傾向”；在他看來，這就是麥克盧漢“媒介即信息”的意思。^⑧如果說，在麥克盧漢看來，每一種媒介都提供了一種審視世界的“新的尺度”，那麼，這種麥克盧漢所謂的“新的尺度”對於波斯曼而言，就是新的意識形態偏向。^⑨

伊尼斯在其一生的研究中突出強調了媒介的心理影響和社會效果，對衆多後來的媒介生態學家產生了深遠影響。麥克盧漢就曾多次談到“我樂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漢璀璨》看成是伊尼斯觀點的註腳。首先是他關於文字的心理和社會影響的觀點，然後是他關於印刷術心理和社會影響的觀點。他注意到我的一些著作，我爲此而受寵若驚，於是就生平第一次找他的書來讀。從第一篇‘米涅瓦的貓頭鷹’開始讀”^⑩。伊尼斯的傳播偏向論與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堪稱是貫穿整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一條紅綫。伊尼斯關於媒介偏向的理論、口頭法和書面法對立的觀點也直接開啓了哈弗洛克、麥克盧漢、沃爾特·翁、愛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洛根、德克霍夫等後繼者關於口語文化與文字文化的浩大研究工程。例如，曾與他共事的哈弗洛克專攻古

①② [加]哈樂德·伊尼斯：《帝國與傳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何道寬譯，第3、5—19頁。

③④⑤ [加]哈樂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第1、27、53頁。

⑥ [加]哈樂德·伊尼斯：《變化中的時間觀念》（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何道寬譯，第26頁。

⑦ Marshall McLuhan, *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69. 此處採用了李昕揆博士的譯文。

⑧ [美]尼爾·波斯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何道寬譯，第7頁。

⑨ 金惠敏：“‘圖像—娛樂化’或‘審美—娛樂化’——波茲曼社會‘審美化’思想評論”，《外國文學》6（2010）。

⑩ [加]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 編：《麥克盧漢精粹》，第139頁。

希臘文化，他的《柏拉圖導讀》、《繆斯學會寫字》^①、《希臘的拼音文字革命及其文化影響》等一系列著作都莫不以此為主題；其《柏拉圖導讀》全書講的就是希臘口頭文化和書面文化的衝突。^②洛根的《字母表效應：拼音文字與西方文明》重點關注拼音文字何以會鑄成高度理性化的西方文明。愛森斯坦的《印刷業：變化的媒介》、《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等則重點關注的是印刷文化帶來的有別於口頭文化的社會新氣象。德克霍夫同樣重視語言和文字技術對人類文明產生的歷史性影響，區別了“口語的聽”與“能讀能寫的聽”之間的差異，對識字與聽覺缺失、重視傾聽傳統的內在關聯進行了細緻論述。^③沃爾特·翁也把人類文明劃分為“聽覺文明”、“讀寫文明”、“電子文明”等幾個階段，但他區別了“原生口語文化”（primaryorality）與“次生口語文化”（secondaryorality）。他在《口語文化和書面文化》一書中指出，從信息傳播方式上看，遠古文明是一種口耳相傳的“聽覺文明”，是原生口語文化，“就是尚未觸及文字的文化”；^④“電子技術又把我們帶進了一個‘次生口語文化’時代。這種新的口語文化和古老的口語文化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參與的神秘性、社群感的養成、專注當下的一刻甚至套語的使用，都是如此。然而就其本質而言，這樣的‘次生口語文化’是更加刻意為之的自覺的口語文化，是永遠基於文字和印刷術之上的口語文化”。^⑤“次生口語”雖貌似古代的口語文化，但它與原生口語文化有着質的不同。它不是原生態的口語，而是虛擬的模擬會話，是後印刷時代的文化產物，是電子時代的新的文化形態。如果說麥克盧漢等人更多強調了電力時代人類的“重新部落化”，而忽視了這種新的“部落化”畢竟與遠古的“部落化”有着質的不同，那麼，沃爾特·翁則更為清醒和敏銳地看到了兩者間質的差異。

三

馬歇爾·麥克盧漢是北美媒介生態學思想中承上啓下的代表，也是該譜系第一代的核心人物。麥克盧漢的著述中有伊尼斯、格迪斯、芒福德的蹤跡，也有阿諾德（Matthew Arnold）、利維斯（Frank Raymond Leavis）等人打下的歐洲印刷文化和精英文化傳統的烙印，更站在時代的前沿，感受到來自通俗文化、電子文化的猛烈衝擊。麥克盧漢長期以來學習和講授文學，印刷文化傳統是他的文化根基。他自嘲長期以來是“文字人”，對於他學習並孜孜以求的那種印刷媒介的性質一無所知。他追隨着詹森（Samuel Johnson）、卡萊爾（Thomas Carlyle）、阿諾德、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利維斯延續的偉大傳統，也深受20世紀30年代以來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倫敦興盛一時的通俗文化的影響——“他們把電影、廣播、廣告甚至漫畫當做新的‘語言’來研究”的做法直接影響了麥克盧漢，他日後也正是把媒介當做新的“語言”來研究的。這彌合了他作為文學教授和信息先知的雙重身份，接通了兩個大為不同的領域。^⑥麥克盧漢正是基於他的文學素養自覺地以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眼光從感性學的角度審視媒介技術的，從一開始就有別於以往的傳播媒介研究學派，看重的是媒介技術對人的感知的深刻影響。他雖然自視為“印刷人”，但更清醒地意識到了媒介的劇烈轉型和文化的劇變，一直在努力超越印刷文化的窠臼，以充分理解洶湧革命的電力技術產生的“感覺和思想的新的結構”^⑦，因勢利導，在新媒介技術造就的世界裏做到遊刃有餘。麥克盧漢理論中頗為醒目的“後視鏡”說法，可能就與他的這種置身新舊交替時代的感慨有關：“我們今天生活在後機械時代，我們的處境與那些在汽車時代仍

① Eric Alfred Havelock, *The muse learns to write—reflections on 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② Eric Alfred Havelock,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③ [加]德克霍夫：《文化肌膚：真實社會的電子克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8），汪冰譯，第128—129頁。

④⑤ [美]沃爾特·翁：《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何道寬譯，第2、103—104頁。

⑥ [加]斯蒂芬妮·麥克盧漢、戴維·斯坦斯 編：《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何道寬譯，第3頁。

⑦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周憲、許鈞譯，第4頁。

然用馬車時代的思維方式思考的人有相似之處。對馬車時代的人而言，汽車最引人注目的事實就是：它無須用馬牽引。同理，對那些習慣電報神奇性質的人而言，廣播看上去就是無須電綫的電報。對習慣機器的人而言，自動化是令人恐懼的一種極端的機械化。”^①“後視鏡”意味着人與新媒介、新技術需要一個磨合期，人們總是帶着舊的眼光被拋進新的時代潮流中，舊的媒介技術帶給人們的餘緒總是比新的技術潮流“慢半拍”。由此，人們總是倒退着進入未來，總是在進入未來很久後纔逐漸回過味來，領略他們置身的時代發生了什麼樣的劇烈轉型。

麥克盧漢既不是一個技術悲觀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極端化的技術樂觀主義者。在許多時候，他對技術革新演進抱持謹慎的樂觀，對於技術的雙重效應有着清醒的認識，時刻警惕技術的災難性影響。受他的影響，第二代的核心人物波斯曼把麥克盧漢對媒介技術的警惕和反思這一極大大強化了，“尼爾·波斯曼挖掘了麥克盧漢研究的陰暗面。……電視底層的信息對理性、禮貌和許多好的文明的東西，都具有破壞性”。^②波斯曼將人類文化劃分為工具使用文化階段、技術統治文化階段和技術壟斷文化階段；他充滿憂慮地強調，文化向技術投降將瓦解人類精神價值，失控的技術“造就的文化將是沒有道德根基的文化”。^③而第三代代表人物萊文森則與波斯曼相反，樂觀地堅信新媒介總是作為補救性媒介出現的，總比舊媒介更勝一籌，因為它把舊媒介作為內容整合到自身中。例如，在2000年的時候，“因特網擺出了這樣一副姿態：它要把過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來，當做自己的手段來使用，要把一切媒介變成內容，要把這一切變成自己的內容。開始的時候，因特網的內容是文本。到了90年代，它擴張以後就包括了圖像和聲音。到了世紀之交，它又提供了網絡電話（Internet Telephone）、綫上音訊播放（RealAudio）、綫上視頻播放（RealVideo）。因特網證明且暗示，這是一個宏大的包含一切媒介的媒介”。^④

如果說北美媒介生態學巨擘麥克盧漢關注的是媒介技術演替影響下的工業人（《機器新娘》）、印刷人（《谷登堡星漢璀璨》）、電子人（《理解媒介》），視野所及主要是電子技術的文化、心理影響，第二代的波斯曼更多關注的是電視等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和精神文化的複雜影響，那麼，第三代的萊文森和橫跨三代的洛根則對網絡傳媒乃至新新媒介藝術更為青睞。可以說，萊文森近年來陸續推出的《數字麥克盧漢》、《手機》、《新新媒介》，洛根新近推出的《理解新媒介：延伸麥克盧漢》等著作，將媒介生態研究推進到了數字時代、移動互聯時代和全媒體時代。但是，從他們的論述中人們仍能窺探到麥克盧漢打下的深深印記。萊文森談到，麥克盧漢創造“地球村”這個詞彙時，地球村還是一個窺視者的村落，根本不是互動意義上的村落。正是憑藉網際網絡和“萬維網”，地球村裏的互動性纔變成了現實。麥克盧漢率先預告了這個數字化時代的徵兆。^⑤洛根也指出，理解一種媒介與其他媒介的互動是麥克盧漢開創的方法論的重要成分，是媒介生態學的核心。研究“新媒介”時，理解媒介的互動更為重要。這是因為，數字化以後，媒介融合的趨勢出現了，媒介之間的關係也更加緊密了。麥克盧漢所謂的電力媒介的許多特徵將在“新媒介”中得到強化，也有一些特徵會被削弱。但麥克盧漢強調外形/背景關係的思想依然給人以啟示，人們需要將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裏的媒介置入互動式數字媒介即“新媒介”的背景中去考察。^⑥

與萊文森同為北美媒介生態學派第三代傳人的紐約新罕布夏大學的梅羅維茨則在汲取麥克盧漢的媒介思想和戈夫曼（E. Goffman, 1922—1982）的社會“擬劇理論”（dramaturgical theory）的基礎上建構了自己的“媒介情境論”（Medium situation theory），關注電子時代對人們社會行為的影響。這可以說是把麥克盧漢的媒介技術影響感知的理論向媒介技術影響社會情境，進而影響個體行為方面進行了拓展。

① [加]斯蒂芬妮·麥克盧漢、戴維·斯坦斯 編：《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第1頁。

②④⑤ [美]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何道寬譯，第24、7、39頁。

③ [美]尼爾·波斯曼：“自序”，《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何道寬譯，第2頁。

⑥ [加]羅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麥克盧漢》，第6—7頁。

四

與萊文森、梅羅維茨同為第三代的中堅的德克霍夫，在中國學術界遠不如前兩人那樣廣為熟知，但他在北美媒介生態學理論譜系中卻值得一提。在麥克盧漢之後，德克霍夫作為麥克盧漢的嫡系傳人和多倫多大學“麥克盧漢文化與技術研究部”（簡稱“MPCT”）的核心人物，對於繼承、發揚多倫多學派的媒介生態學傳統功不可沒。在多倫多學派中，德克霍夫與麥克盧漢最為神似，最得麥克盧漢風範——注重跨學科資源的整合、凝練，善於捕捉看似不相干的事物間隱微的內在關聯，不注重構築包羅萬象的宏大、嚴密的理論體系，而是見微知著、闡幽釋微，著述異彩紛呈、別具隻眼。德克霍夫同樣承繼了伊尼斯、麥克盧漢以來關注媒介技術對感知、文化的影響，從傳播媒介入手理解文化變遷的一貫取向，把媒介視為人的延伸，以預言家的眼光揭櫫了方興未艾的新興技術將如何導致社會文化、精神心理的劇變；他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對電視所作的論析尤為精到，指出電視堪稱是“伸出我們身體之外的集體想象力，並組合於一種同感的、電子化的遠端民主之中”。電視技術不僅延伸了意識的可接收性和可發送性，而且它還滲入並修改其用戶的意識。隨着虛擬實境和遠端機器人技術的出現，人們幾乎可以把自己的意識投射於身體之外並且“客觀地”看上一番。電視和電腦使人們能夠把信息處理從大腦中挪到眼前的熒幕上。視頻技術不僅與人們的大腦相關，而且與人們的整個神經系統和感官都相關。^①德克霍夫的著述充分顯示了北美媒介生態學跨學科研究的取向，傳播學、神經生物學、心理學、語言學、藝術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都在他的考察範圍內。例如，在分析電子技術產生的社會後果時，他既關注技術普及與大眾心理接納度的內在關聯，認為除了價格日益低廉的因素外，技術還需要與集體心理契合，再好的技術也不能把自己強加於毫無準備的公眾。他也關注技術使用過程中日益融入日常生活，使用戶產生戀物情結的依賴心理機制，認識到“個人機器”與人形成的是夥伴般的親密關係。高效快捷的電腦還會使兒童染上“速度癮”。他還關注人機交互導致的用戶日益成為“半機械人”的主體存在新情態。^②

尤為重要的是，德克霍夫在《文化肌膚：真實社會的電子克隆》中不僅重申了麥克盧漢關於媒介是人的延伸的重要思想，認為電子媒體和賽博空間延展了人們的神經系統和肢體，進而也必然會影響和改造人們的精神心理，而且意識到虛擬現實技術將帶來劃時代的文化劇變。該書還對技術心理學、心理技術學等進行了全面探討，可謂是對麥克盧漢中樞神經系統延伸說的進一步發揮。他所謂的“技術心理學”，旨在研究人在技術創新影響下的心理狀態。由於技術延伸了人們的心理功能，因此技術心理學就顯得格外重要。他強調，人們的心理現實不是一種“天然的”東西，而是取決於人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其中，各種技術延伸對人們施加影響的方式也會塑造人們的心理現實。^③相比於麥克盧漢，德克霍夫進一步強調了技術延伸的擴張效應，他指出：“由於每種技術都延伸了我們的一種官能並超越我們的身體限制，所以它們激勵我們去獲得對自身身體的最佳延伸。”^④他還提出了“心理技術”這個術語，以此界定那些“模擬、延伸或放大我們心智的技術”。^⑤德克霍夫的“技術心理學”已經超越了電子技術心理學的層次，他意識到了虛擬實境的革命性影響，他指出虛擬現實技術將使觀念與現實間的鴻溝被填平，“虛擬實境允許你實際進入自己想象力的產物之中”，^⑥這在以往是不可思議的。顯然，這一劇變將給今日的審美實踐帶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氣象。如果說，在虛擬現實技術產生之前，人們是以置身其外的方式審視、鑒賞置放在面前的藝術品，受眾與作品中的角色判然有別，那麼，虛擬現實技術則使人們進入虛擬實境，操控其中，遊戲其中，一個受眾可以進入“藝術作品”充當其中的某一角色，隨機創設、改變作品中的藝術情境，因而也改變藝術作品的格局和路徑的時代到來了，藝術品處於未完成時，作者與受眾、藝術與現實、虛擬與真實涇渭分明的界限也將消弭。德克霍夫還高度重視

①②③④⑤⑥ [加]德克霍夫：《文化肌膚：真實社會的電子克隆》，第7—8、3—4、5—6、4、7、113頁。

貨幣的電子化，他指出：“當貨幣在純粹電子化的金融交易中走向數字化融合時，貨幣自身的性質也在發生變化。當貨幣周轉的速度達到光速時，它就變成了純粹的能量。”^①由此，電子化的貨幣勢必變成一種具有純粹象徵意義的符號，一種信息社會的主導語言符碼。語言與光相會了，它將使我們的文明為之逆轉。德克霍夫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天新的“共同感覺”是數字化的過程，“通過數字化，所有的信息源，包括物質現象和自然過程，也包括我們的感官類比——如在虛擬實境系統中的類比——都被一元化為0、1順序排列的數字串”。^②

德克霍夫與麥克盧漢一樣置身於電子時代和互聯網絡時代的臨界點，一樣熱情展望即將給人類社會帶來全新內涵的互聯網絡時代。但是，麥克盧漢逝世在20世紀80年代，那時互聯網絡時代還未到來；德克霍夫則目睹了互聯網絡由萌芽到成型，再到日臻成熟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德克霍夫自覺延續麥克盧漢的研究思路和理論框架，又與時偕行，高度關注媒體技術的新進展和媒介文化的新動態，對電子媒介和數字媒介的社會影響、文化效應作了獨出機杼的闡發。如果說他1988年推出的《字母和人腦：寫作的偏側性》^③還像多數麥克盧漢弟子一樣關注拼音字母對人類認知的深刻影響，那麼，1991年推出的《人腦框架：技術、心智和貿易》則更為關注電視、電腦等媒介技術對經濟、市場、文化、心智的複雜影響。1995年，他的彙集十多年研究成果的論文集《文化肌膚：真實社會的電子克隆》出版後，被譯為多種語言，在全球廣為傳播，也為他贏得了“媒體預言家”的美譽。

此後，基於對日新月異的網絡媒介技術的關注，德克霍夫又先後出版了《互聯智慧：網絡社會的到來》^④和《智慧結構》等著述。在這些著述中，他將之前提出的命題做了進一步的展開和發揮，區別了電視和出版物等將信息不容分說地推向受眾的“推送媒體”(Push Media)與網絡媒介這種允許受眾隨選信息、提供針對性信息服務的“拉進媒體”(Pull Media)，也顯示了波斯特(Mark Poster)所謂的單向信息傳播的“第一媒介時代”和互聯交互的“第二媒介時代”的差異。《互聯智慧：網絡社會的到來》和《智慧結構》重點論析了網絡傳播對人類認知的影響，“網絡”成了德克霍夫這一時期論述的中心。^⑤德克霍夫還非常注重在現實社會文化生活中具體運用麥克盧漢的思想，他的《〈阿凡達〉= Pinotxo 2.0》對電影《阿凡達》作了別開生面的分析。^⑥他與費德曼(Mark Federman)合著的《經理人麥克盧漢——新思維的新工具》，更是將麥克盧漢的媒介思維運用於商業管理領域，力圖帶給經理人新的啟迪。^⑦

總之，雖然北美媒介生態學派三代各位代表人物的觀點論說不盡相同，在一些問題（如技術演化的前景、媒介偏向等）的側重點明顯有別，甚至有不小的分歧，但他們都堅定地承續和發揚媒介生態學的一貫思路——媒介影響着生物生態、社會生態、文化生態。無論是伊尼斯對媒介時空間偏向的論述，還是麥克盧漢視媒介為人的感覺和精神的延伸；無論是凱瑞對於電報導致了地方時間死亡的敏銳洞察，還是梅羅維茨對電視等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複雜影響的細緻入微的具體分析，乃至德克霍夫對虛擬現實技術、電子貨幣的革命性影響所做的洞燭幽微的揭櫫，無不顯示了媒介生態學家們關注媒介技術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和塑造作用的共同旨趣。

[編者註：該文係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文學藝術與現代傳媒的關係研究”(13JJD750010)、中國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數字化語境中新世紀以來的文藝審美實踐研究”(13BZW027)的階段性成果。]

①② [加]德克霍夫：《文化肌膚：真實社會的電子克隆》，第81、104頁。

③ Derrick De Kerckhove, *The Alphabet and the Brain: The Lateralization of Writing*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8) .

④ Derrick De Kerckhove, *Connected intelligence: the arrival of the Web society* (Toronto: Somerville House, 1997) .

⑤ MPCT. Derrick De Kerckhove. <http://www.mcluhan.utoronto.ca/derrickdekerckhove.htm>.

⑥ Derrick De Kerckhove, "Avatar = Pinotxo 2.0", *Digitum: Las humanidades en la era digital* 12 (2010) .

⑦ Derrick De Kerckhove, Mark Federman, *McLuhan for Manager: New Tools for New Thinking* (Toronto: Viking Canada, 2003) .